

汉语空间隐喻对英语介词习得的负迁移研究

张佳佳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 广东 广州 510800

DOI:10.61369/EIR.2026090016

摘 要： 汉语方位词“上/下”“里/外”语义边界模糊、语境依赖性强，空间概念化方式整体笼统；英语介词依托意象图式与几何属性精细划分空间关系，并通过概念隐喻系统性延伸至时间、状态等抽象语义域。汉英空间认知模式的本质差异，导致汉语母语者在习得 in、on、at、under、below 等核心介词时，易将母语空间隐喻思维直接投射于英语，产生系统性语言偏误。本文以概念隐喻、意象图式、图形—背景理论与概念迁移理论为支撑，厘清汉语空间隐喻的认知特征，剖析汉英空间编码、隐喻扩展的核心差异，阐释母语负迁移的生成机制，并结合典型习得偏误，提出认知导向的英语介词的学习策略。

关 键 词： 汉语空间隐喻；英语介词；负迁移；概念迁移；意象图式

A Study on the Negative Transfer of Chinese Spatial Metaphors in English Preposition Acquisition

Zhang Jiajia

Guangzhou City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800

Abstract： Chinese spatial terms like "up/down" and "inside/outside" have vague semantic limits and high dependence on context, indicating a comprehensive and generalized way of spatial concept. In contrast, English prepositions use image schemas and geometric properties to distinguish finely the spatial relations, and extend systematically into other domains such as time, state and manner through conceptual metaphor. This basic difference in spatial thinking causes Chinese learners of English to apply their native spatial metaphorical concepts directly to the target language forms when learning the core prepositions, resulting in systematic mistakes. Based on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Image Schema Theory, Figure-Ground Theory and Conceptual Transfer Theory,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s the cognitive features of Chinese spatial metaphors, compares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patial representation and metaphorical extension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and explains the mechanisms of first language induced negative transfer. Educational suggestions for learning prepositions from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are also proposed.

Keywords： Chinese spatial metaphor; English preposition; negative transfer; conceptual transfer; image schema

引言

英语介词兼具空间定位与抽象隐喻功能，是二语习得的难点。与英语精细化的空间语义划分不同，汉语方位词语义边界宽泛、概念界定模糊，二者空间概念建构体系的错位，构成汉语母语者习得的核心障碍。

概念迁移理论指出，母语对目标语的影响深度作用于认知方式、概念分类与隐喻思维层面^[1]；学习者常无意识地将母语的时空认知逻辑迁移至英语表达中，形成“形式相似、语义不对等”的习得偏差^[2]。汉语“上/下”“里/外”等方位词可泛化至空间、时间、等级、情感等多重语义域，而英语介词的语义扩展严格遵循意象图式规则，二者隐喻路径的差异，是学习者介词持续性误用的核心诱因^[3]。

基于此，本文聚焦三大问题：汉语空间隐喻的认知特征、在英语介词不同语义域的负迁移表现及其认知生成机制，旨在从认知语言学视角破解偏误根源，为介词认知化教学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一、理论基础

（一）概念隐喻理论

Lakoff 与 Johnson 提出，隐喻是人类基础认知思维，而非单纯修辞手段，人类依托具象的空间身体经验，建构时间、社会关系、情绪等抽象概念的认知体系^[4]。英语介词的多义性正是该理论的典型体现：所有介词均以具象空间原型义为核心，通过隐喻、转喻机制向外辐射，形成层级清晰的语义网络^[5]。例如 in 的核心义为“容器内部包围”逐步延伸至状态、时段、范围等抽象语义；on 核心义为“平面接触支撑”，可拓展至媒介载体、依附关系等场景。脱离认知理据的机械搭配记忆，无法掌握介词语义系统的内在规律。

（二）意象图式理论

意象图式是人类身体经验沉淀形成的稳定认知框架，是语义解读与语言输出的底层逻辑^[6]。介词习得核心关联容器、支撑、垂直、点位四类基础图式，英语介词的选择严格依托图式差异精准区分：in 对应容器包围图式，on 对应平面支撑图式，at 对应点位定位图式，under 与 below 依托垂直方位图式形成细分差异。反观汉语方位词，虽同样源于身体经验，但不依托几何图式划界，高度依赖语境变通，导致学习者易混淆不同空间图式，出现概念泛化误用。

（三）图形—背景参照框架

Talmy 的图形—背景理论指出，空间表达的精准度取决于对焦点图形与参照背景的层级划分^[7]。英语空间表达要求使用者精准判别背景的几何属性，区分点、平面、容器、场域四类形态，以此匹配对应介词。汉语空间表达侧重整体场景感知，无需拆解空间几何特征，仅通过“在+方位词”即可完成场景描述。这种认知差异导致汉语学习者习惯整体识解场景，忽视英语介词的精细化匹配规则，诱发高频偏误。

（四）概念迁移理论

概念迁移突破了传统形式迁移的研究局限，证实母语的概念范畴、分类逻辑与隐喻模式会隐性干预二语加工^[8]。二语学习者即便掌握目标语的表层语法形式，仍会无意识沿用母语认知逻辑建构语义。汉语学习者的介词误用本质是概念迁移偏差：将汉语方位词宽泛的语义覆盖范围，强行匹配英语精细化的介词语义范畴，形成系统性、顽固性的负迁移效应。学习者应该意识到语言知识的学习并非只限于形式与意义，更重要的是语言概念的习得。从认知概念层面对比分析语言间介词使用差异，可以帮助学习者打破原有思维模式，有效避免在跨语言交流过程中因认识偏差而导致的介词误用^[9]。

二、汉语空间隐喻的认知特征

（一）范畴边界模糊

汉语“上/下”“里/外”等核心方位词语义覆盖范围极广，无清晰的几何边界界定，具体语义完全依托语境判定。以“上”为例，可指代平面接触、高位空间、事物附着，还可延伸至领

域、媒介、活动场景等抽象范畴；“里”既可指物理封闭空间，也可泛指抽象领域与心理空间。这种语义泛化特性让汉语表达灵活简洁，但无法与英语介词形成一一对应的语义匹配关系，为习得偏差埋下隐患。

（二）隐喻扩展具象化

汉语方位词向抽象域延伸时，始终保留鲜明的空间具象特征，语义衍生路径直观单一。“上”和“下”的意向图示直接源自我们的外在感知，主要有以下四种隐喻图示：“数量”“等级”“时间”或“状态”。在数量上的概念隐喻映射为：数量增加为“上”，数量减少为“下”；例如：工资上调、消费下降、物价上涨、物价下跌、温度上升、速度下降、声音上扬、数量下调。时间较早为“上”，时间较迟为“下”；社会地位或等级高为“上”，社会地位或等级低为“下”；状态好为“上”，状态不好为“下”^[10]。“上”衍生的“上进、上升、上扬”均保留“高位、正向”的空间趋向，附带积极语义色彩；“下”衍生的“下滑、下调、低落”延续“低位、回落”的空间特征，自带消极语义倾向。英语抽象语义扩展多依托独立词汇完成，介词仅承担空间原型的系统性延伸，不会直接通过方位介词承载情感与评价语义，二者隐喻扩展逻辑差异显著。

（三）文化负载较重

汉语空间方位隐喻深度内嵌传统文化思维，形成固定的等级价值关联^[10]。“上”和“下”在社会等级层面的概念隐喻映射为：社会地位或等级高为“上”，社会地位或等级低为“下”。“上”天然关联尊贵、高位、优质，如“上级、上品、上层”；“下”对应卑微、低位、劣质，如“下策、下属、下流”。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认知，会让学习者潜意识将“上=优、下=劣”的思维投射到英语介词使用中，遮蔽英语介词纯粹的空间几何属性，引发隐性搭配偏差。

（四）认知偏差具象体现

汉语“里”常被学习者等同于英语 in，却忽视英语的几何图式区分：“电视里的新闻”需用 on the TV，英语将电视屏幕定义为二维平面而非容器；“纸上写字”固定搭配 on the paper，而非贴合汉语字面认知的 in。汉语万能方位词“上”是误用重灾区，可覆盖平面、领域、媒介多重场景，但英语需根据语义场景切换 at、on、in。汉语“下”的垂直方位界定笼统，不区分正下方与低位差异，而英语严格划分 under（垂直正对、接触覆盖）与 below（单纯低位、无垂直约束），这也是学习者高频出错的核心节点。

三、汉英空间隐喻的差异及其负迁移表现

（一）空间域：空间编码与整体感知的错位

汉语空间编码侧重整体场景与语境方向，不拆解参照物几何属性。例如，汉语表达空间方位的框架介词“在……上”在英语中就分裂为 on、above、over。因此英汉介词的语义范畴差异会对二语学习者介词习得造成干扰^[11]。汉语统一用“上”描述“墙上、树上、天上”，英语则严格区分：on the wall（平面接触）、in the tree（树冠空间包围）、in the sky（开放式场域）。学习者

受母语整体认知影响,常误用 on the tree 表达树上的鸟,违背英语容器图式的使用逻辑,是典型的母语负迁移表现。

（二）时间域：时序隐喻与时间分型的冲突

汉语依托垂直空间隐喻建构时间体系,以“上/下”划分时序,如“上周/下周、上午/下午”,无需对时间形态进行细分。李锡江指出,汉语时间认知只有时间点和时间段两个维度,语言编码也比较笼统,通常使用介词“在”、方位词“里”和时间名词;介词“在”和时间名词既可标示时间点也可标示时间段,且不论长短^[10]。相较之下,英语介词承担时间分型功能,依托空间图式延伸出精准规则:at 对应点位、on 对应日期、in 对应长时段。母语这种无差别的时间表达习惯,使学习者难以识别英语时间的“点一面一段”层级差异,导致 at/on/in 高频混用。

（三）抽象域：泛化延伸与系统图式的偏差

英语介词的抽象语义扩展具备严格的图式系统性,各介词语义边界清晰、分工明确。in 聚焦状态与范围, on 聚焦依附与媒介, at 聚焦点位与场景。汉语方位词的抽象延伸是单一语义泛化,无明确图式约束。学习者常将汉语“工作上、学习上”的领域义直接映射至 on,造出 on work、on study 等非地道表达,而英语规范搭配为 at work、in study,本质是母语泛化隐喻对英语系统化语义体系的错误干预。

（四）文化域：文化隐喻的干扰

汉语方位与等级、价值的绑定思维,会形成隐性负迁移。学习者潜意识认为 on 对应“上位、优质”,过度滥用 on 表达正向抽象场景,而英语方位介词与价值评判、等级高低无固定关联, high/low 承担等级语义,介词仅表征纯粹空间与逻辑关系。这种文化认知错位,不会产生显性语法错误,但会造成表达僵化、不地道,属于高阶隐性负迁移。

四、汉语空间隐喻负迁移的认知形成机制

（一）概念范畴不对等

汉语方位词属于宽范畴语义概念,单一词汇覆盖多重空间与抽象关系;英语介词是窄范畴精细化概念,各词语义边界清晰、分工独立。从跨语言比较的角度来看,母语与二语的概念关系包括三种情况:概念对等,指以两种语言为中介的概念有相同的范畴结构和边界;部分对等,指两种语言的范畴部分重合;概念不对等,指学习者的母语缺少二语的某一语言范畴,反之亦然^[12]。学习者默认汉英方位表达一一对应,将汉语单一方位词的所有义项,强行投射到某一个英语介词上,打破英语介词的图式语义边界,形成系统性搭配偏误。

（二）原型义的过度泛化

学习者通常先掌握英语介词的原型空间义,再依托母语经验类推拓展用法。当汉英存在局部语义重叠时,学习者易将局部重合等同于完全对等,无限泛化原型义。例如由 on the table (桌面接触) 的正确用法,错误类推 on the tree,忽视二者空间图式的本质差异,暴露了母语认知类推对二语规则的干扰。

（三）图形—背景框架的母语固化

汉语长期的整体场景识解思维,让学习者形成固化认知,习惯将场景笼统判定为“位置”,不会主动拆解参照物的几何属性(点、平面、容器、场域)。在介词选择时,跳过英语核心的图式判别步骤,机械套用母语方位对应关系,这是介词精细化误用的核心认知根源。

（四）习得阶段差异化负迁移特征

母语负迁移在不同习得阶段呈现差异化特征:入门阶段表现为显性直译误用,完全依托汉语方位词对应英语介词;中级阶段学习者掌握部分语法规则,但仍存在选择性迁移偏差,抽象域误用频发;高阶阶段显性错误减少,转为隐性负迁移,表现为表达不地道、搭配僵化、刻意规避复杂用法。整体来看,母语空间隐喻思维不会随语法知识积累自动消退,长期影响学习者的概念重构过程。

五、学习启示

基于上述认知机制分析,英语介词教学需摒弃传统“搭配记忆+机械纠错”的模式,转向认知重构式教学,聚焦汉英概念差异与语义理据:

第一,依托意象图式建构介词语义网络。以 in、on、at、under 等核心介词的空间原型图式为核心,梳理其从具象空间到抽象时间、状态、关系的隐喻延伸路径,让学习者掌握语义扩展的内在逻辑,摆脱死记硬背的学习模式。

第二,开展汉英认知显性对比教学。明确阐释汉语方位词“宽泛模糊、语境依赖、文化绑定”与英语介词“精细划分、图式驱动、语义系统”的核心差异,破除学习者“汉英一一对应”的错误预设,从根源规避概念错配。

第三,强化图形—背景判别训练。针对性训练学习者对参照物几何属性的识别能力,区分点位、平面、容器、开放式场域四类场景,建立“先判图式、再选介词”的程序化思维,提升介词使用精准度。

第四,剥离文化隐喻的不当干扰。专门区分汉语方位等级隐喻与英语介词的中立属性,纠正学习者“上=优质、下=低端”的潜意识投射,解决高阶表达不地道的隐性间题。

六、结束语

汉语空间隐喻对英语介词习得的负迁移,是汉英空间认知模式、概念建构逻辑、隐喻扩展路径差异的必然结果。汉语方位词语义宽泛、语境依附性强、内嵌文化等级思维,以整体化方式建构空间与抽象关系;英语介词依托意象图式与图形—背景框架,实现空间语义的精细化划分与系统化隐喻延伸,二者认知体系的错位是习得偏误的核心根源。

母语负迁移的本质并非简单的语言形式错误,而是概念范畴错配、原型义过度泛化、认知思维固化的综合产物,且在不同习得阶段呈现显性与隐性差异化特征。介词习得的核心不是语法规

则的堆砌，而是空间认知概念的重构。教学与学习中，需突破传统翻译式学习思维，立足认知语言学理据，厘清汉英空间隐喻差异，重构英语介词的图式语义体系，从而有效消解母语负迁移影响，实现英语介词的精准、地道使用。

参考文献

[1] Odlin T. Language Transfer: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Learning[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2] Jarvis S, Pavlenko A.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M]. New York/London: Routledge, 2008.

[3] 李明. 汉语“上/下”空间隐喻对英语介词习得的负迁移作用[J]. 中国外语, 2022, 19(1): 64-71.

[4]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5] Tyler A, Evans V. The Semantics of English Prepositions: Spatial Scenes, Embodied Meaning and Cogni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6] Johnson M. The Body in the Mind: 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 Imagination, and Reason[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7] Talmy L.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 1[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

[8] 李欣, 刘文静. 概念迁移视角下中国英语学习者介词误用及分析——以介词 at, on, in 为例[J]. 现代语言学, 2022, 10(6): 1228-1235.

[9] 陈辰, 黄龙杨. 英汉纵向空间维度介词的意象图式和隐喻拓展——以空间介词“上”“下”“up”和“down”为例[J].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22, 37(10): 31-39.

[10] 李锡江. 二语时间维度介词习得中的迁移可能性研究[J]. 现代外语, 2023, 46(2): 200-212.

[11] 王钟哈, 李锡江. 语际相似性、输入频率与二语水平对中国学生英语介词习得的影响[J]. 第二语言学习研究, 2025(20): 28-39.

[12] 蔡金亭, 常辉. 概念迁移研究的理论框架与方法框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1, 53(5): 707-719.